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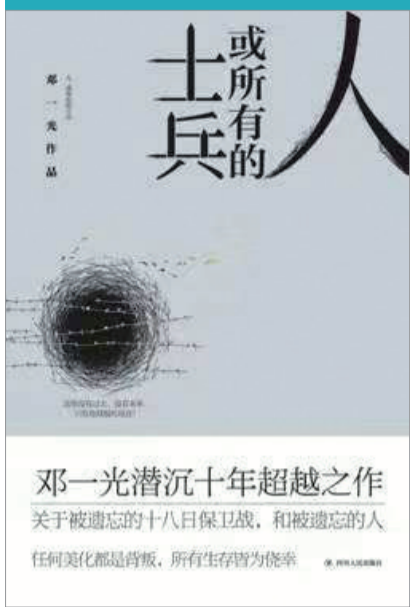
杜佳

重大现实题材创作：

各自的出发与抵达

陈泽宇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理解战争，理解文明



作家邓一光南下深圳后的这部沉吟之作，足有77万字。《人，或所有的士兵》讲述了中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官郁漱石的生活与记忆。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几个小时后，日军突袭香港。由多国部队组成的香港守军经过18天的抵抗，伤亡惨重，宣布投降。中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官郁漱石不幸被日军俘虏，在位于岛屿丛林中的D战俘营度过三年零八个月非人的生活。小说有历史人物，也有虚构的人物；有历史事件，也有虚构的情节，细至每一日的天气变化，每一颗子弹的轨迹呈现，广及对国家、时局、战争、人类的思考，这个虚构的故事具有了非虚构的真实和沉重。邓一光说，对于这个故事，“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为侥幸”，“远离战争，无论它以什么名义”。

2019年12月28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深圳市文联、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深圳市作家协会承办的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当代文坛的大力士，或虚实之间的摆渡人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文坛的大力士。”在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焜明看来，邓一光一贯敢于挑战重大题材，他的力量充沛、视野宽阔，能举起一般作家无法举起的“重器”，他写历史、写人心，兼具英雄主义的情怀与浪漫主义的风格，同时探索人性的深度，充满深邃的思考，《人，或所有的士兵》延续了邓一光一贯的创作风格，但在叙述角度和知识体系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显现出质的飞跃。

邓一光的战争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格局中独树一帜，其《父亲是个兵》《我的太阳》《我是我的神》等长篇作品都名重一时。“在这些作品中，邓一光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一览无余。他笔力遒劲，油墨重彩；人物刚烈伟岸，襟怀坦荡。鲜明的个人风格，使他的这些作品具有非常高的个人辨识度，其来路和谱系也不难识别——他对当代的革命历史文化、甚至传统的古代经典小说，有继承和借鉴，当然更有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评协主席孟繁华长期关注邓一光的创作，在他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更是一部圆融如意的作品，作者选取海量历史材料，使小说“深陷”虚实之间，在历史与虚构的两岸涉渡。“把它当做历史来读，里面充满了虚构；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读，里面又充满了历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抗战”给20世纪中国人留下最沉重的历史创伤，却又推动了中华民族主体性认同，《人，或所有的士兵》从抗战中发掘题材与思想的新意，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也不同于邓一光以往战争题材作品的书写道路，它在集体主义精神与个人合法性、理想的坚持与幻灭、正面的历史与颠覆的边缘等等看似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之间努力地寻找某种可能。“这部作品不只是重新书写了新时期‘人’的主题，而且赋予了更为深厚的时代感”。

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评论家胡平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卓而不群又超乎想象的作品，它“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成熟大作——‘刚刚崭露头角’的写作者，无论如何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书名中提到“人，或所有的士兵”，意味着这部书眼光不局限于沧海横流中的一两个英雄人物，而是把视角转向战争漩涡中所有的人，“人在战争中无以名状的命运，无可回避的失重、软弱与无助，以及面临生命威胁时的恐惧都在这部作品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对史料的艺术处理是创作的难点，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评论家李一鸣认为，邓一光的能力即在于能把无穷的史料化为己用，把材料故事化、形象化、心灵化、艺术化。“他的作品中反映的是关于人类的一些大问题，关于民族、国家、人性，关于人类处境、自我救赎与灵魂安放，但他所引的材料没有让人觉得‘戴着脚镣’，恰恰相反，他巧妙地刀尖上舞蹈了”，李一鸣说，“这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不可替代性”。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或回归总体性叙事

作家莫言在创作谈《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用长度、密度、难度概括长篇小说的标志和“伟大文体”的尊严。而在《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评论家顾建平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经满足了长度、密度和难度的外在要求，同时也是具有力度、态度和深度的内在集合体。“这部小说的角度非常特殊，不是正面写战争，而是从法律陈述中控诉一个罪犯的角度去写战争。在这个时间点上，作者可以去回述整个战俘营的生活，也可以回述整个战争。态度则体现在小说的扉页，‘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战争的残酷、对人性的摧残，在这本书里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深度看，邓一光的写作恰恰不是为了反战而反战，他从郁漱石个人的悲剧展现了世界文化的悲剧，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悲剧。”

顾建平从角度、态度和深度中发现了邓一光对文化悲剧性的集中表达，而刘大先则从小说庞大的体量中读出一一种“崇高感”。“这不是故事本身的崇高感，而是一种历史的崇高感。”

刘大先以致密的思维勾连了一系列的世界近代史知识背景：19世纪中期以来殖民主义和老帝国的瓦解、东亚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失衡、整体知识变革中中日欧美权力关系的变化、民族主义的扩散和模仿、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以及有关东亚新秩序的新论述和重构……刘大先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表现出不同表述的合法性，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规矩”方式讲述了战争，而不是站在某个充满义愤的、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角度。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从文本的叙述方式里发现了更多奥秘，在他看来，邓一光刻意使用了一种有限的叙述视角，“小说中有多个叙述者，不是用上帝式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讲，只是从个人的角度说出个人的经历，每个人只知道个人那点事儿”。梁鸿鹰认为，这种有限的叙述视角有利于在短时间内构建宏阔的历史事件，读者可以从不同的人物口中了解到时代的风云变化以及不同

人物所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对战争与命运的理解。此外，梁鸿鹰还观察到了小说中的“闲笔”。《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叙写战争发展的同时，还提到了许许多多当时的文学人物，看似是闲笔，实则不闲，反而构成了一种文化、文学的交流史书写。这些珍贵的片段让小说生发出多姿多彩的枝节支脉，为文本增添了丰富性。

相比于“苦难之作”或“历史证词”的说法，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评论家于爱成更倾向于用“浩瀚之书”来评价《人，或所有的士兵》，小说中无所不在的总体化写作状态，是他关注的重点。在为《长篇选刊》2020年第1期“佳作推荐”栏目撰写的同期评论中，于爱成做出了精当的表述：“这是一种总括化的写作。作品试图对太多的问题思考、叙述、发问：关于战争与和平，民族与国家，国家与个人，民族性与国民性，以及关于宗教，关于文化（包括审美），关于语言（国别民族区际意义上的语言区别），关于战争伦理（正义观、英雄主义观等）。”于爱成认为，多视角、多声部叙述并不少见，但拼贴式、多重例证式、多重互证式的写作近年来极为罕见，在这种总体性叙事中，小说更容易产生分歧与辩论，迸发出思想的力量。

珍视软弱与恐惧之心，或一种思想实验

顺着总体性叙事的角度分析，于爱成探查到了小说中更多的幽微：郁漱石代表着一种反主流的、沉思的、抗议的、反叛的隐喻，他的自尽是看穿了“政治的肮脏、死亡的把戏、生存的真相、命运的捉弄”之后的选择，是真正的解脱。同时，这种解脱又是对人类社会“恶托邦”的反拨，“一种反英雄主义之后的英雄主义的回归——以自绝的方式，为曾经的脆弱、示弱、恐惧，跟自己和解，给自己一个交代。这是一种无畏的死，终无牵挂的死，坦然的死。他死了，还有谁不是在苟且偷生？还有谁不是幸存者？苟且偷生者将何以自处？幸存者将何以生存？这是作品给我们的一个提问。”

历史没有清晰明了的线索和规律，但也不是纯粹的杂乱与偶然，刘大先敏锐地捕捉到了小说平静叙述中的“法”与“反法”的隐形结构：作为历史进程中例外状态的战争，暂时地超越“法”的规则，但在战俘营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所中，例外状态成为了“永久”的制度化，其背后是恐怖的专制秩序。“而当战后我们用一种‘法’的方式来审判超越于‘法’的状态之时，它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历史的‘反法’。”在刘大先看来，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是文本营造的历史反讽，也恰恰是“人”与历史之间充满张力的结构。

邓一光对人性中的灰色地带有着更坦然的理解，在小说中，邓一光借人物之口说道，“我觉得人们的内心比我们知道的复杂，不光有善良和邪恶，还有别的。我觉得真实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总在变化，变得难以把握，人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在他们身上，哪些事情是真实的。”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展现出的这种庞杂的思想性已经先验地选择了读者，设立了阅读的门槛。岳雯视小说中对于文化与政治的悖论、道德与自由的对立、恐惧与暴力的关系等方面的思想实验为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也感受到了这部作品所带来的阅读挑战性。郁漱石性格的复杂性已经有目共睹，张莉试图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来提供答案。“文学不是一个终极道德的审判者，而应该是提出困惑的那一个。阅读能够塑造一个新的‘人’。张莉认为，郁漱石是一个深具文学之心的人，他对整个世界有悲悯心，而文学本质上站在弱者一边。在张莉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种“内窥镜式”的写作，小说中把所有的问题内化于心，把所有的人放到极端的语境里考验人性的不确定性，人性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接受作者的试验。

谈到作品的主旨时，邓一光说：“它只想告诉人们，人最可贵的是不是英雄品质，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任何光明的结尾，都与这个旨意相悖。”隋丽君、张柠、李朝全等评论家也都约而同地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同贺绍俊所言，“人类的伟大就在于能从恐惧中积攒其力量，寻觅到希望”。

从接触选题到图书出版，历时7年。责编张春晓说，“也许惟有这样才能匹配作者创作所经历的艰辛”。《人，或所有的士兵》在交稿以后，至少经过了3次以上的修改，从插图的使用到注释的位置，从封面的确定到版式的变化，种种细节也都颠覆数次。始终如一坚持与等待，背后是一个写作者的严谨与自律。据邓一光说，全书所配置的插图中，除了涉及虚构地点D营的两幅图外，其他全部源自史料。这些地图在书中出现，已然参与构成着热奈特意义上的“副文本”，它们和书籍的标题设计、章节标识装帧、文章脚注以及长长的参考资料书单一同穿梭在这77万字中，并伴随、修饰和加强着文本本体。

研讨会现场，评论家们征引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战争文学来和《人，或所有的士兵》对比，数量之多、辐射之广以至于我无法全部记下这些作品的名字。它们有《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红岩》《铁道游击队》《高山下的花环》《战争和人》，也有《伊利亚特》《五号屠场》《死无葬身之地》《永别了，武器》以及《战争与和平》……能够与如此之多的佳作反复参照，《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品质与气象已经无需多言，但也正是互文见义多、正中靶心少，可见对一部具有挑战性的书做出当下的、真正的、全面的理解之困难。

孟繁华说，衡量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学史上是否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新的典型人物以及新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批评家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远的“距离”才能对这部小说作出更准确的解读和阐释，但《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经毋庸置疑是一部能够在文学史上留得下的作品。截至现在，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经名列2019《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选刊》年度金榜、《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佳作、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度小说排行榜、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扬子江文学评论》2019年度文学排行榜等多份榜单。正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人，或所有的士兵》是第一部把中国的民族战争提升到世界格局的长篇小说作品，这部作品的最大贡献，是它将会提升中国作家和读者对战争与文明的理解。

2015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指出，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三个定位”以及云南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主阵地，2018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云南作协具体实施，邀请全国知名作家陈应松、葛水平、徐剑和曾哲，一半到云南进行历时一年的体验生活、深入采访，分别完成《山水云南》《同心云聚》《云门向南》《经纬滇书》4部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其中《云门向南》为徐剑、一半合著。

参与该项目的作家践行文艺工作者增强“四力”的要求，遍访云南，走入“万绿之宗”、生物多样性密集的高黎贡山区、西双版纳地区、藏区香格里拉、边境口岸瑞丽、河口地区，实施整族帮扶整乡推进的独龙江和革命老区乌蒙山片区，收集到大量一手资料，共完成4部作品。为此，2019年12月27日，中国作协创研部、云南作协联合在京举办了“云南重大现实题材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云南作协主席范稳出席会议。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副主任李朝全共同主持。

邱华栋回顾2019年到访过的扶贫攻坚现场：湘西十八洞村、吉首、凤凰，甘肃临潭、天水，广东清远……这些边远地方、山乡村寨与他之前的印象大不相同，其中很多地方是他还在当记者时去过的，如今早已变了模样，“你很难想象这些过去荒僻贫困的地方经过巨大的努力如今发生的变化”，当他带领作家走进中国作协对口帮扶的甘肃临潭县山村，一行人受到不小的震撼，粉墙黛瓦的徽式建筑掩映在烟雨林雾中，恍惚中让人以为自己正置身江南。一次次行走中他切身感受到“作协和作家能够参与到国家这样一个伟大事业中，并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这是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范稳认为，参与创作的5位作家付出了艰辛努力，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作家的社会责任，他们多次往返于云南各个地方，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深入到城镇村寨、田间地头、工厂地去感受云南边地生活的火热现实。5位作家的创作是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重要实践和收获，折射了在全国“脱贫攻坚”伟大进程中的云南路径和云南篇章，为重大现实题材文学创作作出了探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研讨会上，胡平、张陵、梁鸿鹰、贺绍俊、李一鸣、王山、杨晓升、李云雷、刘大先、傅逸尘等评论家深入探讨了5位作家此次在云南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创作中的探索和突破。

《山水云南》：纳入生态观是未来文学创作重要的价值取向。彩云之南，万绿之宗。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云南有“地球动植物最后的诺亚方舟”之称，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有着世代相传的生态信仰。尽管作者陈应松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到会，但他创作《山水云南》带来的思考和启示仍然成为研讨会上的焦点。前有“神农架系列”、《森林沉默》等作品为基础，陈应松独具荆楚文化底蕴、彰显源自屈原瑰丽恣肆文学传统的创作风格吸引着李云雷的目光，“用这样一种风格如何写云南的山水，这是我特别好奇的。”李云雷注意到，作家着意收敛了浪漫见长的抒写风格，转而代之以更加贴近现实的笔触，写云南具体的山水。在李云雷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适宜的策略调整。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胡平有河北、东北、云南三个去向可以选择，而他毫不犹豫地选了云南。至今，他仍视云南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不失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和“生态的选择”。陈应松书中写到的很多地方胡平都去过，阅读过程让他自然地回忆起很多往事。亲身经历的过往和书中对故地现实的呈现交织重叠，形成强烈对比。下乡的年代，响应号召砍伐雨林种植橡胶林，当时还没有明确的环保意识，人们只是本能地感到心疼。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今天，环保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与之相适应，文学言说的疆域也在改变。胡平认为，“是时候抛弃过去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愿望，通过文学作品追索人对自然的保护和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这应该成为未来文学重要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学不能光写成绩、变化，生态文学也要观照历史，要书写人类观念的变迁”。

《同心云聚》：打破文体界限，独到视角探寻巨变背后的风景。读《同心云聚》，傅逸尘最突出的感受是报告文学写作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报告文学写作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注重主观体验表达的小说、散文，另一个则是追求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写作在这两者之间寻找自身的定位。近些年，报告文学创作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探索，其原有的规则和界限也在改变、扩展。

作为一名山西作家，葛水平对于云南少数民族边地风俗和生活经验经历了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傅逸尘注意到，这个采访的过程相当扎实，具体体现为作家“进入”描写对象，多采用直接叙述或引述，而较少对自己生活经验及情感做表达。作家几乎从当地每一个少数民族、每一个地域中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有特点的人物来写，他们虽然来自各行各业、拥有不同身份，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普通人。由此，作品呈现给读者的是“硬碰硬的”能够直接进入普通人生活经验里去的一种表达样貌。除此以外，傅逸尘认为作家还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写作，“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各民族生存生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民风民俗演变。阅读中，语言、文字、服饰、宗教信仰等大量缜密的历史信息扑面而来”。

到过云南多次，梁鸿鹰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的一次调研。所到之处，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云南人要改变家乡面貌、投身国家发展进程、打通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雄心壮志。时隔两年，读到葛水平的《同心云聚》，他之前的直观印象找到了依据。云南边疆安定团结的氛围是经过现实考验的，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这份祥和不是脆弱的，而是牢不可破的。葛水平的写作富于女性的柔和与感性，这次创作《同心云聚》无疑是她走出“创作舒适圈”的一次尝试和探索。

梁鸿鹰现场朗读了作品第83页作者的一段议论：“这个社会中的普通人是一些知足者，在平凡俭朴的事物当中获得幸福……”他认为书中这样看似朴素琐碎的笔触不在少数，而这些细碎悠长的议论恰恰是于事实当中收获的生动真切与富有智慧的勉励。在梁鸿鹰看来，“它不仅是共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一部简史，同时也是一部人心史和情感史”。

《云门向南》《经纬滇书》：担当使命，重新认识主题写作。读徐剑和一半的《云门向南》，刘大先认为作品主题比较抽象——云南已经成为我国一个向南亚、东南亚辐射的中心。同时这个主题涵盖的范围特别广，包括云南的特产、边境贸易、航运等等，如何将如此抽象而广阔的主题结构实现为一个形象化的文本，作者采用了“有我”的写作策略，通过写作者与当地人的互动，带来一种“现实感”。刘大先进而分析，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体现为在政治和经济上如何辐射、联动，最重要的内涵是树立中国话语、中国价值，用文化和价值观影响他者。而这一宏大主题的落地是作家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发



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来讲述的。张陵谈到自己的阅读体验时说，读《云门向南》好像在读游记散文，作家仿佛信笔涂鸦，谈古论今、感怀山河大川的笔墨俯拾即是。而这些看似信笔涂鸦的一个个细节，恰恰共同凝聚为对云南人民生活最生动的连接，进而是对“一带一路”战略充满诗意的注解。

李一鸣称自己阅读《云门向南》的过程是一次“达致心灵的体验”。他认为，作品展现了“有视野的写作、有张力的写作、有诗情的写作和在场的写作”，这样一部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真实感、历史感，作家创作力的“拓展之美”和语言的“浓郁诗意”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经纬是秩序，是条理，也是线索。作家曾哲在云南从2019年5月至8月的奔波采访线索变成了经纬和纬线，经纬交汇编织，精准标记了一个个脱贫攻坚的故事。书中写到的几十位“老乡”是由作者从滇西北到滇东北，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源县、临沧的沧源佤族自治县采访的51个人物中精选出来的。这种采访实录的写作方式在贺绍俊看来是“下了苦功夫”的，可以看到作家拉近与受访者距离的努力，“比起采访，作家与受访者的接触更像聊天，不做过多加工，最大限度真实还原扶贫现场和扶贫对象，非常生动、真实”。

杨晓升和李朝全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经纬滇书》中的一个细节，作家在书的结尾处列出了为脱贫攻坚献出宝贵生命、因公殉职的73位逝者名录。杨晓升认为，作家把人的情感、思想、行为方式和为了摆脱贫困所做的种种努力客观生动地呈现出来，“虽然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但仍然存在为了人民利益的悲壮牺牲，以列出名录的方式向这些当代英雄致敬是很震撼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值得作家们去书写”。书中有一个人物给李朝全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在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因公殉职的云南昭通大关县玉碗镇扶贫干部王文贵，“在一个孩子眼里，父亲经常惦记的事是下乡，所以当别人告诉她爸爸去世了，躺在那里，孩子的直觉反应是‘躺在那里的是假爸爸，真的爸爸下乡去了’……这就是文学，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和事都是文学应该表达的”。

